石铭婷，党玮，仲声.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研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2）：86-98.
SHI Mingting，DANG Wei，ZHONG Sheng. Study on the path of female immigrants′ social adapt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2）：86-9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2.010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研究

石铭婷[1]，党玮[2]，仲声[2]
（1.甘肃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2；2.兰州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2）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女性移民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其在安置地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和参照群体等因素会对自身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且并非同步增长。其中，生活适应水平的提升是最快的，而经济适应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同时，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经济适应状况在搬迁初期会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状况，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生活适应状况会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产生滞后但持续的影响。另外，女性移民的无酬照料被忽视，也是限制其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因素。应从落实安置政策、完善就业技能培训、开展社区活动和加大对女性移民无酬照料的扶持等方面入手，提升女性移民社会适应水平。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变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2-0086-13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是未来全党工作的重心所在，要坚持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致力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提升乡村地区发展质量。而作为精准扶贫工程之一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的目标之后，及时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整体战略中，促进其“能融入、快致富”远景要求的实现。

宁夏中南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根深蒂固，自然环境的限制使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无法实现就地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将贫困人口搬迁到适宜生存的地区成为更加合理的选择。从2016年开始，自治区政府对中南部贫困人口整体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截至2018年底，自治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完成20 549户共82 060人的搬迁，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已达到国家贫困村脱贫标准。2020年7月，在团队的追踪走访中发现，绝大多数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已经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移民存在生计手段匮乏、生活入不敷出、社会融入困难等问题，这是进一步推动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阻碍。其中，女性移民由于在文化水平、务工经验等方面固有的缺陷，搬迁后更容易存在务工难，以及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的问题，尤其是从山区搬迁到北部川区的劳务和县外女性移民，其社会适应问题更为突出。而女性移民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其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能有效促进移民家庭的和谐发展。因此，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变化特征，探究其路径，并最终帮助女性移民获取发展能力，促进实现两性移民的

收稿日期：2022-07-04 **修回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西部项目“新疆南疆农村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反贫困研究”（15XMZ050）；兰州交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甘肃省农村生物质能资源化开发的经济性评价及优化研究”（2020029）
作者简介：石铭婷，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发展。

平等，进而提高女性移民和移民家庭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目标的关键所在。

易地扶贫搬迁是由政府主导的，为了解决某一区域居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将该区域居民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的政策。长效脱贫是易地扶贫搬迁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所在，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不仅可以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还可以改善农户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时可以增加农户的生计多样性，便于重构社会网络关系，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解贫手段[1]，而要全面实现长效减贫的关键又在于将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向发展共同体转变[2]。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问题有效途径这一观点得到普遍共识的同时，它的一些负面影响，或者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偏差与缺失的部分同样也引起了关注，例如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个体适应与社会转型的协调，社区重组、产业配套、心理适应等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的解决[3]。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以扶贫脱贫为目标的迁移形式，这种迁移形式以政策为主导，因此其移民的安置意愿、搬迁方式都与自主迁移有很大差异。也正基于此，其在搬迁后自身心理、行为、生计与生活方式等与迁入地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的调整适应过程也相对复杂[4-5]。这导致了这种形式移民的社会适应必然会是漫长的过程，因此对这类移民的扶持和帮助，应以综合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为主，而不应仅是解决生计和家庭经济问题[6]，这其中就包括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7]。例如，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劳务安置移民失去土地后的不安等，都会严重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8]。而且，由于社会适应状况不佳，也必然会导致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普遍存在的社会适应障碍。出现“人在安置区，心系老家”的现象[9]。这种社会适应障碍，根源在于生计手段匮乏，经济适应不佳；最终落脚到对“老家”的思念，对和谐亲朋邻里关系的向往，即心理归属感的缺失[10]。但随着在安置区生活时间的延长，这种搬迁初期的社会适应状况会发生变动，生活适应开始逐渐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主要有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11]，这也引起了很多研究的关注。

不同安置方式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与变迁也被广泛关注。安置方式的划分依据有多种，就地安置、近迁安置和远迁安置是按照安置区与迁出地的距离为标准进行的划分。而根据生计属性的不同，可分为农业有土安置、非农劳务安置和复合型安置三种类型。此外，还可根据安置特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7]。在集中安置模式下，居住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移民在“老家”居住相对分散，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在搬迁后，居住空间变得较为集中，活动范围也相对缩小，易由此产生家庭矛盾，会影响移民在安置地的社会适应[12]。对非农劳务安置而言，如何稳定移民生计是重中之重，政府应以此为核心，着力改变移民的思想观念，并制定和实施稳定移民生计的安置政策，例如积极扶持地方产业发展，配合产业扶贫政策，吸纳移民就业，解决劳务安置移民生计渠道匮乏的问题。相比之下，就近安置移民面临的生活环境变迁和生计问题较少，且可在较大程度上调节人口分布和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提升移民生活质量，加快移民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13]。针对城市劳务安置——非农安置模式下移民存在的社会适应问题，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引导移民转变落后的思想和观念；在制定和实施移民后续安稳政策时，应充分重视移民的权益，扩大移民政治参与度，充分调动移民的主人翁心态；同时积极扶持有效吸纳移民就业的产业发展，拓宽移民致富渠道；平等对待城市居民和移民，积极开展一些社区联谊文化活动，增强城市居民和移民之间的互动与交往[14]。

近年来，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逐渐受到更多关注。能否顺利适应和融入迁入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是衡量移民迁移成效的核心指标，而女性妇女面临着很多来自家庭内外的压力和挑战，而这些压力成为了她们融入当地社会的限制性因素[15]。首先，针对女性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语言障碍和文化歧视是阻碍社会融入的首要因素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同[16]。女性移民在参加相关培训后，能够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在家庭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并有利于促进她们融入社会，以及推动她们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17]。此外，家庭暴力和缺乏社会支持等因素是影响移民妇女福

祉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更具弹性的家庭可持续性概念，以更好地适应和尊重女性移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动机[18]。虽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作为维系移民家庭和谐稳定重要力量的女性移民，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却鲜有独立研究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与之相近的女性婚姻移民和劳动力移民则受到的关注较多，例如相关研究发现教育层次、户籍和文化背景等会影响非农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其中归属感缺失是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和谐的家庭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女性婚姻移民的心理缺失，有利于促进她们的社会适应[19]。总体上，婚姻移民具有较高的经济适应水平，但生活适应易受气候、饮食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出现较大差异，且会随之产生心理适应水平的下降，普遍存在心里孤独感[20]。女性劳动力移民同样会遇到这一问题，虽然她们在主观意愿上会尝试积极适应城市生活，但自身教育与文化背景，加上生计特征和家庭照料的羁绊，降低了她们的生活适应水平[21]。如果能提升女性劳动力移民的教育水平，合理协调女性移民的家庭照料分配，促进其劳动参与，则对其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极有助益[22]。虽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专业化研究较为缺乏，但关于女性婚姻移民和劳动力移民的研究都可对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改善和提升给予一定的启示。

总体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政策方案，因此在这一政策出台之日起，针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变迁、可持续生计、长效脱贫、社会关系重构等多个方向的研究已十分深入。移民与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涵盖不同安置模式、不同类型移民、不同移民群体社会适应现状的阐述、社会适应问题的探究。但还存在几个需要补充的内容：第一，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是维系移民家庭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不可或缺的力量，女性移民搬迁后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是带动整个移民群体在安置区实现“稳得住”，进而“逐步能致富”的关键所在，然而对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却未能给予足够关注。第二，相关研究缺乏时效性，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大背景下，未能体现出新时期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特点。现有有关女性移民的适应问题主要聚焦于女性婚姻移民、女性劳动力移民和生态移民女性，上述女性移民均具有相应的时代背景，对于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以及巩固脱贫成果的有效性缺乏足够的参考性。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1. 理论基础

社会适应理论源自于生物学的“适应”理论，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经典进化论学说是生物适应理论的真正起源，指出适应是生物有机体对于其所处环境的调适过程[23]。社会适应，是人类个体或族群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心理、行为上的适应过程。社会适应一般包括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维度，其中，经济适应是指移民经过自我调适，适应当地经济环境的过程。生活适应是移民在生活方式上与迁入地主流方式的适应过程。心理适应是与主流群体在群体归属感上趋同并最终在心理上实现相互认同的过程。移民社会适应，则是具体到移民个体，在进入迁入地后，自身心理、行为、生计与生活方式等与迁入地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的调整适应过程。

需求层次理论源自于人本主义理论，需求层次结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第一类包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属于缺失性基础需求。第二类包括社交需求、尊重需求、求知需求、社交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属于成长性进阶需求[24]。在大多数情况下，高层次需求必须在低层次需求得以满足之后才会出现[25]。其中，女性移民生理与安全的需求体现了经济适应的内容，社交需求体现了生活适应的内容，而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则体现了心理适应的内容，从而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者之间存在制约关系[26—27]。随着女性移民在安置区居住时间的延长，其自身的社会适应状况会发生变化，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等缺失性基础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女性移民会尝试主动追求更高层次成长性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在生计方式和生活环境变化更大的劳务和县外安置女性移民中更为强烈。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28-29]，结合社会适应理论，从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方面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由于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都无法直接观测得到，因此将这三个变量均做为潜变量。女性移民在安置区的实际经济状况是经济适应的直接体现，收入和外出务工情况是考察女性移民生计方式和收入水平的典型指标。从调查可知，超过90%的女性移民为已婚妇女，考虑到女性移民的经济依附性，研究采用与女性移民经济联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外出务工两个可观测变量来测度经济适应状况。生活适应体现在女性移民日常生活的出行、就医和社交等方方面面，由于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且在短期内变化不明显，故采用当地居民态度、与当地居民交往情况和与其他移民交往情况三个可观测变量来测度生活适应状况的变化情况。心理适应反映了女性移民对自我“群体身份认同感”和对安置区“地域认同感”的状况，是女性移民是否真正完成社会适应过程的充分体现，研究采用身份认同感和居留意愿来测度心理适应状况。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经过多次测试后得到了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变化趋势和路径的最简模型，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赋值见表1。

表1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指标体系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代码	含义及赋值
生活适应	当地居民态度	X_1	非常不热情取1，不太热情取2，一般取3，比较热情取4，非常热情取5
	与当地居民交往情况	X_2	不交往取1，偶尔交往取2，经常交往取3
	与其他居民交往情况	X_3	不交往取1，偶尔交往取2，经常交往取3
经济适应	收入	X_4	与女性移民经济联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外出务工情况	X_5	外出务工取1，没有外出务工取0
心理适应	身份认同感	X_6	认为自己是老家人取1，一半老家人一半移民地人取2，移民地人取3
	居留意愿	X_7	非常不愿意取1，不太愿意取2，无所谓取3，比较愿意取4，非常愿意取5

3. 模型构建

如图1所示，经济适应是女性移民在搬迁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如何在安置区开展生产劳动与经济发展，进而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得以维持生计，是女性移民后续进行社会活动、积极适应安置区生活的前提和基础[30]。生活适应是女性移民最终适应安置区生活的关键一步，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当地居民较为友好的态度都有利于提升女性移民在安置区的身份认同感，增强她们在安置区长久生活的意愿；而外出务工在增加女性移民家庭收入，改善其所在家庭经济状况的同时，也为女性移民提供了与当地人和其他移民交往的机会，使她们容易在相与公事的过程中产生共鸣，进而促进女性移民的生活适应，这也充分体现了经济适应在女性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心理适应的实现是女性移民最终适应安置区生活的最后一步，是社会适应最高层次的一个环节，反映了女性移民内心的“归属感”，它的实现标志着女性移民完成了搬迁后的社会适应过程[31]。如前所述，良好的生活适应水平有利于提升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水平，而相对稳定的收入是女性移民在安置区扎稳脚跟的基础，只有拥有得以维持生计的收入，才能让她们的心里真正“踏实”，也才能提升她们的“移民地人”意识，这充分体现了经济适应在提升女性移民心理适应水平中的必要作用。此外，外出务工为女性移民提供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机会，有利于增进女性移民与他人的磨合与融入，提升女性移民在安置区的“归属感”，这同样体现了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促进作用[32]。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探究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动态趋势及其内在影响机制[33]。

$$X_1 = \lambda_1 Y_2 + \varepsilon_1$$
$$X_2 = \lambda_2 Y_2 + \varepsilon_2$$
$$X_3 = \lambda_3 Y_2 + \varepsilon_3$$
$$X_4 = \lambda_4 Y_1 + \varepsilon_4$$
$$X_5 = \lambda_5 Y_1 + \varepsilon_5$$

$$X_6=\lambda_6 Y_3+\varepsilon_6$$
$$X_7=\lambda_7 Y_3+\varepsilon_7$$
$$Y_2=\beta_2 Y_1+\varepsilon_8$$
$$Y_3=\beta_1 Y_1+\beta_3 Y_2+\varepsilon_9 \quad (1)$$

式中 Y_1、Y_2、Y_3分别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λ为因素负荷量，X为反映社会适应特质的可观测变量，β为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系数；ε为方程模型中所有无法观测到的误差值，即为残差[34]。本研究只探讨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心理适应的影响，以及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对于反馈作用暂不探讨[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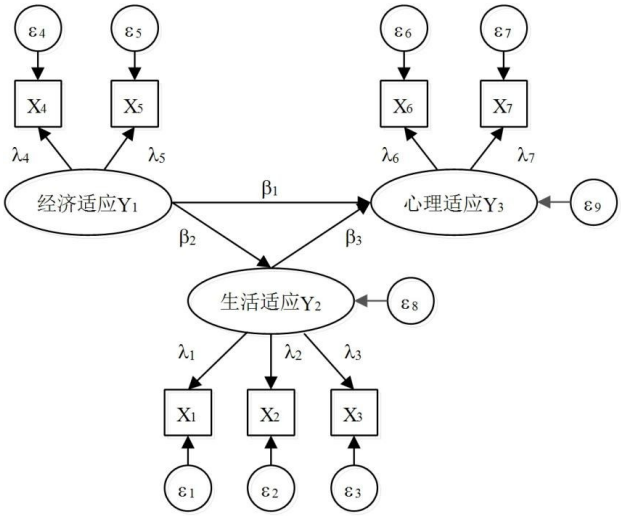


图1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模型路径图

（二）数据来源

研究聚焦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趋势及路径的变动状况，因此先后收集了两轮数据。首轮数据于2019年收集获得，涉及宁夏“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13个区县49个乡镇105个村或小区，以女性移民2018年整年的生计、经济、生活和心理状况为主要的访谈内容。此次调研经整理后共获得女性移民有效样本253份。次轮数据于2020年获得，是基于首轮“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追踪调查，以女性移民2019年的生计、经济、生活和心理状况为主要的访谈内容，此次追踪调研经整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272份。

三、结果分析

（一）总体变化特征：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并非同步增长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女性移民2018年和2019年社会适应各可测变量的表现形式是否一致，从表2可知，Levene检验对应的sig值除收入外均小于0.05，从而除收入外均不满足方差齐性条件。据此，除收入外，表中其他变量的t值和sig值均为方差不相等时所对应的检验值[33]。由表2可以看出：

1. 经济适应方面。女性移民的经济适应水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基本维持在与上一年持平的状态。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外出务工的均值由2018年的0.369增加到2019年的0.452，均值方程的t检验显著性为0.053，接近显著性水平，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在于，劳务女性移民的外出务工机会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劳务女性移民的生计方式在搬迁后发生了很大改变，且多安置在县城及中心城市周边，经济相对较为发达。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务女性移民通过应聘、熟人引荐或政府分配的公益性岗位等方式，都越来越多的谋得一份生计；而对于有土安置女性移民来说，其2019年的外出务工均值与2018年持平，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务农是有土安置女性移民主要的生产劳动活动，再加上安置区离城镇较远外出打工不便，所以外出务工机会并没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T检验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均值		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		均值方差的t检验	
		2018	2019	F	Sig	t	Sig
生活适应	X_1	3.452	3.768	188.063	0.000	−62.363	0.000
	X_2	1.516	2.136	213.216	0.000	8.456	0.000
	X_3	1.825	2.629	9.014	0.003	−42.048	0.000
经济适应	X_4	8.949	8.931	1.376	0.241	0.303	0.762
	X_5	0.369	0.452	13.004	0.000	−1.938	0.053
心理适应	X_6	2.083	2.426	25.597	0.000	−4.308	0.000
	X_7	3.984	3.982	9.213	0.003	0.027	0.978

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加。在收入方面，2018年的均值为8.949，2019年的均值为8.931，且t检验的sig值为0.76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与2018年相比，2019年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的收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对于劳务安置方式下的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来说，其2019年的收入比2018年有所增加，且接近5%的显著性水平；而有土方式下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的收入均值却从2019年的9.246下降到2018年的8.8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可以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致使收成不稳定。

2. 生活适应方面。女性移民的生活适应水平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得到了显著提升。从表2可以看出，当地居民态度的均值由2018年的3.452上升为2019年的3.76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区当地居民对女性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变。在与当地居民交往方面，描述性统计结果中的均值由2018年的1.516上升到2019年的2.136，且均值方程的t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2018年相比，2019年女性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有显著增多。在与其他移民交往方面，与2018年的均值1.825相比，2019年的均值为2.629，t检验的sig值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2019年女性移民与其他移民的交往也呈现出显著增加的趋势。

此外，从上升幅度看，与其他移民交往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增长幅度，这表明，与其他移民的交往情况随着迁入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增多，且比起当地居民，女性移民更倾向于与同属移民的那些人接触与交往。女性移民都是从西吉、海原、彭阳等山区迁出，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处境，并且口音相近，所以同属移民的她们更容易有共同语言。另外，外出务工为女性移民与其他移民的交往提供了机会，在打工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当地人对她们的排挤和歧视，而同属移民的她们更容易相互理解和帮助[25]。

3. 心理适应方面。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水平随着搬迁时间得到了显著提升，其自身的“移民地人”意识大大增强。从表中可以看到，2018年身份认同感的均值为2.083，2019年身份认同感的均值为2.426，且均值方程t检验的sig值小于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与2018年相比，2019年女性移民的身份认同感有显著提升。就居留意愿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其2018年的均值为3.984，2019年的均值为3.982，且均值方程的t检验为0.978，t检验的sig值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居留意愿并没有随着迁入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的原因在于，搬迁后生活质量并没有显著提升，甚至出现下降，影响了部分女性移民居留意愿的提升。

从总体上看，女性移民的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并非同步增长。首先，适应水平提高最快的是生活适应，主要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居民对女性移民的态度显著改善，以及女性移民与当地居民、其他移民的交往显著增多等几个方面，尤其是女性移民与其他移民的交往明显增多。其次，心理适应水平的提升也比较快，女性移民自身的“移民地人”意识大大增强，身份认同感显著提升。最后，女性移民的经济适应水平基本没有显著提升，不管是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的收入，还是女性移民自身的外出务工情况，都没有在统计结果上呈现显著出增多的情况。

（二）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分析

1.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路径模型变量的信效度分析

（1）信度检验

组成信度（CR）主要是评价一组潜在构念指标的一致性程度[29, 35]，亦即所有可测变量指标分享该因素构念的程度，其等同于信度系数（Cronbach α）[28]，其测量标准是大于0.5[34]。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各潜变量的组成信度多数大于0.5，表明本研究各构面可测变量具有较好的组成信度，此信度指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3 路径模型变量的信度、收敛效度分析结果（2018年）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	AVE	KMO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生活适应	当地居民态度	0.56	0.704	0.467	0.570	185.437（0.000）
	与当地居民交往情况	0.94				
	与其他居民交往情况	0.45				
经济适应	收入	0.97	0.692	0.563		
	外出务工情况	0.43				
心理适应	身份认同感	0.72	0.487	0.339		
	居留意愿	0.40				

表4 路径模型变量的信度、收敛效度分析结果（2019年）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	AVE	KMO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生活适应	当地居民态度	0.82	0.696	0.441	0.608	206.427（0.000）
	与当地居民交往情况	0.57				
	与其他居民交往情况	0.57				
经济适应	收入	0.44	0.704	0.577		
	外出务工情况	0.98				
心理适应	身份认同感	0.52	0.407	0.256		
	居留意愿	0.48				

（2）效度检验

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表示潜在变量构念所能解释可测变量变异量的程度[34]，0.36为该测量标准可接受的门坎[31, 34]。本研究的AVE值基本在0.36以上，表示可测变量可以比较有效地反映其潜在变量，各潜在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同时，由表3和表4可知，2018年和2019年样本效度的KMO检验系数分别为0.570、0.608，均大于0.5，各构面可测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偏向关性较弱；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值均小于0.05，模型指标具有较好的效度，表明数据呈球形分布，可测变量中确实存在公共因子，原始数据可提取潜变量做因子分析。此外，模型中所有的因素负荷量均达显著，表示可测变量能够有效反映出它所要测量的潜在变量，该测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34]。

利用bootstrap计算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95%置信区间，若没包含1，则模型具有区别效度[38]。由表5和表6可知，2018年和2019年各可测变量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1，表明潜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不同潜变量之间是能够区别和分离的，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5 路径模型区别效度分析结果（2018年）

	Observed Bootstrap			Normal−based		
x_4	Coef.	Std. Err.	z	P	[95% Conf. Interval]	
X_1	0.111	0.058	1.91	0.056	−0.003	0.224
X_2	−0.009	0.068	−0.13	0.896	−0.142	0.125
X_3	−0.016	0.084	−0.19	0.846	−0.181	0.148
X_5	0.257	0.098	2.62	0.009	0.065	0.450
X_6	0.109	0.045	2.40	0.016	0.020	0.198
X_7	0.030	0.045	0.67	0.502	−0.058	0.119
_cons	8.168	0.278	29.39	0.000	7.623	8.713

2. 模型配适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参考吴明隆[34]和张绍勳[36]等学者的研究，并结合stata15.0输出的结果，选取

表6 路径模型区别效度分析结果（2019年）

	Observed Bootstrap		Normal−based			
x_4	Coef.	Std. Err.	z	P	[95% Conf. Interval]	
X_1	0.019	0.056	0.34	0.731	−0.090	0.129
X_2	0.015	0.062	0.24	0.812	−0.106	0.136
X_3	−0.001	0.074	−0.01	0.991	−0.145	0.144
X_5	0.573	0.069	8.25	0.000	0.437	0.708
X_6	−0.051	0.048	−1.06	0.290	−0.146	0.044
X_7	0.058	0.039	1.46	0.143	−0.019	0.135
_cons	8.465	0.248	34.13	0.000	7.979	8.951

x^2/df、RMSEA、CFI、TLI、SRMR和CD作为检验模型配适度的指标。一般而言，x^2/df小于2时，表示假设模型的适配度较佳。RMSEA的数值小于0.05时，表示模型适配度非常好；CFI、TLI值大多介于0与1之间，愈接近1表示模型适配度愈佳，上述两个指标用于判别模型路径图与实际数据是否适配的标准均为0.90以上[34]。SRMR值愈大表示模型的契合度愈差，其值在0.05以下时表明模型契合度可以接受；CD为可决系数，越接近于1表示模型拟合越好。通过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可知，就RMSEA值而言，2019年初始样本模型检验结果为0.056，不符合小于0.05的最佳拟合标准。因此，根据stata15.0输出的模型修正指数MI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结果如表7所示。两年的x^2/df值均达到小于2的最佳拟合标准，RMSEA值均小于0.05，CFI值、TLI值均符合大于0.9的拟合标准，SRMR值均小于0.05，CD可决系数的值也非常接近1。总体来说，本研究所构建的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状况很好，通过了模型配适度检验，能够对研究假设进行后续的探讨与分析。

表7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模型配适度检验结果

样本类型		x^2/df	RMSEA	CFI	TLI	SRMR	CD
2018		1.416	0.041	0.973	0.948	0.043	0.999
2019	初始模型	1.851	0.056	0.950	0.905	0.046	0.956
	修正模型	1.254	0.031	0.987	0.972	0.038	0.999
判断标准		＜2.000	＜0.050	＞0.900	＞0.900	＜0.050	越接近1越好

3.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分析

（1）2018年的路径分析：心理适应状况受经济适应状况显著的直接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见图2和图3。从2018年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系数为0.22，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系数为0.09，且不显著。这表明，对于搬来不久的女性移民而言，经济适应状况对其自身的心理归属有显著正影响。搬来不久的女性移民还没有在安置区站稳脚跟，尤其是对劳务女性移民家庭来说，丧失了原先的农业收入后，没有相应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时又面临不得不应付必要开销的问题。所以，寻找外出务工机会，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家庭收入对于她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在这一阶段，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并不显著，女性移民在安置区搬来不久时，对于其他移民和安置区当地人并不熟悉，再加上外出务工机会也不够充分，所以女性移民的人际交往并不活跃，没有起到促进心理适应水平提升的作用；此外，据很多女性移民反映，当地人对她们的态度并不热情，甚至经常有歧视现象，这些现象使得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作用并不明显。此外，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到，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的影响系数为0.088，且并不显著。如前所述，对于这一阶段的女性移民来说，还没有在安置区站稳脚跟，也并不是很熟悉周围的环境和人，从而导致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的作用不显著。

（2）2019年的路径分析：生活适应状况开始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状况

对比2018年的模型估计结果，2019年模型的路径系数存在一些差异。首先，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系数为−0.06，且并不显著；其次，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的影响系数为−0.1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最后，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系数为0.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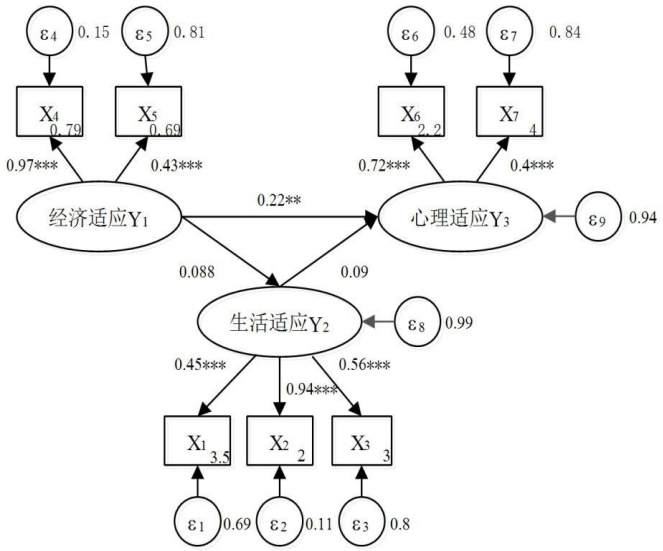


图 2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模型路径图（2018 年）

明，在此阶段，女性移民的生活适应开始对心理适应产生显著的正影响。相比一年前，当地居民对女性移民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有利于促进女性移民的归属感，提升她们在安置区长久生活的意愿。同时，女性移民的人际交往也比之前活跃，尤其是与邻居等其他移民的交往更为融洽，从而让女性移民心理上慢慢有了寄托。而此时的经济适应不再像之前那样对心理适应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了，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在当地的服装厂、菜棚或政府的帮助下逐渐谋得一份生计，这种情况尤其在劳务安置中比较普遍。在相对安稳下来之后，她们便对后续的社会交往和身份归属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也是生活适应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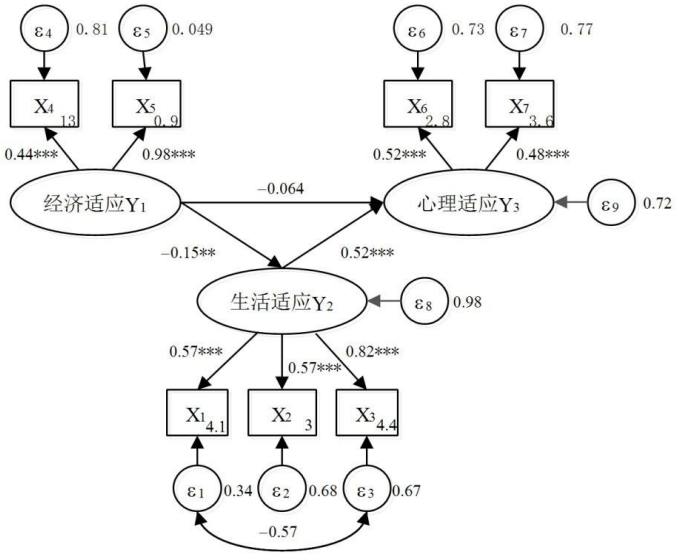


图 3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模型路径图（2019 年）

此外，这一阶段的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人的需求可按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五大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逐渐在安置区谋得一份就业，在相对安稳下来后就产生了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且这

种社会交往所涉及的范围会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广。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发现，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会有新的“人情礼金”等支出发生，尤其是对于有土安置的女性移民家庭来说，这种支出更为明显。对于本身收入并不充裕的女性移民家庭来说，日常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养老等支出是必要的，而对于“人情礼金”等支出就会依据自己的实际经济状况做出选择，这一阶段的经济适应还跟不上生活适应的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作用，这也与前文中T检验的结果相符，即在这一阶段，经济适应与生活适应并非同步增长。

4. 效应分解

结合表8的内容可以发现，在2018年样本中，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是最大（0.223）的，同时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直接效应（0.215）大于经济适应通过生活适应影响心理适应的间接效应（0.008）；此外，女性移民的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意味着，由于女性移民搬来不久，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在安置区生存的问题，所以其自身的实际经济状况是影响心理归属的直接因素；同时，由于还不是很熟悉周围的环境和人，经济适应并不能通过人际交往、当地居民态度等生活适应这一变量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提升发挥作用。

表8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效应分解	2018年			2019年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生活适应→心理适应	0.088	0（No path）	0.088	0.525***	0（No path）	0.525***
经济适应→心理适应	0.215**	0.008	0.223	−0.064	−0.081**	−0.145
经济适应→生活适应	0.087	0（No path）	0.087	−0.154	0（No path）	−0.154***

在2019年的样本中，女性移民经济适应对心理适应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而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的影响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且此时对女性移民心理适应影响最大的是生活适应（0.525）。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女性移民的社交网络逐渐扩大，生活适应已经在影响心理适应中占据主导地位，且经济适应开始通过人际交往、当地居民态度等生活适应这一变量对心理适应产生作用。然而，此时的经济适应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却跟不上生活适应的需求，并没有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而限制了女性移民生活适应的进一步提升，从而间接削弱了女性移民身份认同感和居留意愿的增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1. 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水平并非同步增长。首先，从前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女性移民的生活适应水平随着搬迁时间的延长得到了显著提升，且其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这主要是由于邻里交往、语言适应等都是在日常生活邻域中展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和交往也逐渐频繁，与其他移民之间的理解和帮助也大大促进了她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其次，女性移民的经济适应水平基本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显著提升，是社会适应三项内容中提升最慢的，尤其是有土安置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的收入由于农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出现小幅下降的现象。最后，心理适应水平在整体上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女性移民的“移民地人”意识大大增强，但其居留意愿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

2. 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首先，对于搬来不久的女性移民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在安置区生存的问题，其自身的经济适应水平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水平。然而，由于这一阶段女性移民的人际交往并不活跃，再加上当地人对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存有一定的歧视现象，所以其生活适应对心理适应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搬迁初期的女性移民还没有在安置区站稳脚跟，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也并不熟悉，导致经济适应对生活适应的作用不显著。其次，随着女性移民在安置地居住时间

的延长，生活适应会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产生滞后但持续的影响。在安置地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女性移民社会网络资源逐步积累，这一阶段生活适应水平的提升也显著促进了心理适应水平的提升。同时，这一阶段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依旧在只能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跟不上生活适应的需求，限制了女性移民生活适应的进一步提升，从而间接削弱了女性移民身份认同感和居留意愿提升的程度。

3. 女性移民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务工经历、参照群体和搬迁后的就业状况等因素会对其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女性移民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和务工经历等因素与她们搬迁后的就业状况息息相关，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女性移民搬迁前大多生活在较为封闭的山区，缺少务工经历，且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而对于劳务安置女性移民来说，其搬迁后的参照群体也由原先的同村村民转变为城市务工女性。上述种种都会对女性移民在安置区的社会适应产生阻碍，应在后期政策措施实施中给与针对性的关注。

4. 女性移民对家庭的无酬照料被忽视，是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限制性因素。在前期调研中发现，有一部分年轻女性移民由于需要照顾孩子，无法出去打工，进而影响了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学者认为女性照料活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可视为对潜在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资[29]。然而，这种无酬照料劳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大作用通常被低估甚至是被忽视[30]，这对女性移民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二）对策与建议

1. 安置区政府应做好女性移民相关安置工作

安置区政府应对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做好针对性的安置工作。首先，在搬迁初期，安置区政府需做好与女性移民原居住地相关部门的对接工作，确保女性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后续生活的顺利进行，尤其是要确保随迁子女的顺利入学。其次，安置区政府应严格做好移民补助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工作，落实搬迁前有关部门的补助和减免承诺，做到专户储存专人管理，并设置专门的审计部门，对搬迁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实时监督。

2. 完善女性移民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衔接扶助工作

女性移民自身的就业状况对女性移民自身和整个家庭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应该将就业技能培训置于改善女性移民，特别是劳务安置女性移民经济适应状况的首要位置，集中资源继续推动有针对性、能发挥女性移民专长的职业技能培训，除前文中提到的几项培训外，还需关注不同山区的种养殖技术培训。其次，应重视培训后的就业衔接扶助工作，将相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实时提供给女性移民及其所在家庭成员，以及与安置区周边有诸如家政、烹饪、编制和密集劳动力等需求的企业合作，向这些企业提供相对更能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达到企业和女性移民都能获得收益的双赢目标。

3. 帮助女性移民重构社交网络

和谐的社交关系对女性移民尽快适应所在地生活环境至关重要。首先，社区或村委会可以不定期地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以积极向上的社交活动和文化活动为主的集体活动，并鼓励女性移民积极参加，如在“三八”妇女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或者组织女性移民和当地居民为所在社区、村集体做一些志愿服务工作等，帮助女性移民重构社交网络，提高她们社区融入的程度。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居民的引导和号召，努力让本地居民增进对女性移民的信任，减少对她们的歧视和偏见，以此来扩大女性移民的社交网络。

4. 加大对女性移民家庭照料的扶持和普法宣传

照料负担在国家、企业及家庭内部间的合理分配，有助于降低抚育成本，对实现性别平等目标具有重要意义[30]。首先，国家应出台扶持和资助女性照料工作的相关政策，如对因家庭照料无法出去工作的女性提供补贴、在社区等设置提供照料服务的机构、以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工作单位为家庭照料女性提供兼职岗位和号召男性分担照料负担等。安置区政府可依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鼓励当地企业为女性移民提供小时工等兼职岗位，以及号召男性移民参与家庭照料工作等，帮助缓解女性移民照料负担。其次，安置区政府应

从多方面加强对女性移民的普法宣传，可利用微信、快手、抖音和宣传栏等乐于接受的形式，就《妇女权益保障法》《选举法》《劳动合同法》和《婚姻法》等法律知识进行宣传教育，使女性移民了解和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以增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意识和能力。

参 考 文 献

[1]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等.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20-28.

[2] 王蒙.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6）：44-51.

[3] 方素梅. 易地搬迁与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9）：8-15.

[4] 刘伟，徐洁，黎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2）：218-223.

[5] 刘伟，徐洁，黎洁. 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J]. 资源科学，2018，40（10）：2002-2014.

[6] 辛丽平. 贵州民族地区扶贫移民中的社会适应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19，40（3）：55-59.

[7] 冯雪红. 藏族生态移民的生计差异与社会适应——来自玉树查拉沟社区的田野考察[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50-58.

[8] 侯军岐，马玉璞，马宏建. 脱贫边缘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研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4）：33-40.

[9] 檀学文. 中国移民扶贫70年变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19（8）：2-19.

[10] 梁栩丞，刘娟，胡秋韵. 产业发展导向的扶贫与贫弱农户的脱贫门槛:基于农政分析框架的反思[J]. 中国农村观察，2020（6）：68-82.

[11] 吴新叶，牛晨光.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2）：118-127.

[12] 张华山，吴旭鹏，周现富. 移民安置方式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J]. 水力发电，2013，39（10）：8-11.

[13] 张建. 运动型治理视野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基于西部地区X市的调研[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5）：70-80.

[14] 王丹. 水库移民城市楼房安置的社会适应性评价分析[D]. 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18.

[15] Rai A，Choi Y J. Socio-cultural risk factors impacting domestic violence among South Asian immigrant women：a scoping review[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8，38：76-85.

[16] Salami B.，Salma J.，Hegadoren K.，et al. Sense of community belonging among immigrants：perspective of immigrant service providers[J]. Public Health，2019，167：28-33.

[17] Souza E，Simons J，Billari F，et al. Labour market incorporation of immigrant women in South Africa：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structure[J]. Population Studies，2021（75）：111-131.

[18] Sherilyn MacGregor，Catherine Walker，Tally Katz-Gerro. "It′s what I′ve always don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household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of Somali immigrants in the UK[J]. Geoforum，2019（107）：143-153.

[19] 赵丽丽.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上海市“外来媳妇”的调查[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4-41，70.

[20] 景晓芬，李松柏.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4）：148-153.

[21] 陆芳萍. 上海市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2] 赵梦晗. 生育年龄如何塑造中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J]. 人口与经济，2019（6）：114-126.

[23] Donovan O.，Schaefer. Darwin′s orchids：evolution，natural law，and the diversity of desire[J]. GLQ：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2021，27（4）：525-550.

[24] 王欢.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研究生入会动机研究[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2，35（2）：113-118.

[25]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43（4）：370-396

[26] 贺立龙，郑怡君，胡闻涛. 如何提升易地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实效——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部分地区的村户调查[J]. 农村经济，2017（10）：80-85.

[27] 白南生，卢迈.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移民：方法和经验[J]. 管理世界，2000（3）：161-169.

[28] 杜云素，李飞. 外迁水库移民适应的现状、趋势与路径——基于湖北荆州和武汉移民安置点的调查[J]. 人口与发展，2018，24（2）：31-42，78.

[29] 郭清卉，李昊，李世平，等. 社会规范、个人规范与土壤污染防治——来自农户微观数据的证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11）：1-7.
[30] 曹慧，赵凯. 农户非农就业、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与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基于产粮大县1422份调研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9（5）：52-65.
[31] 徐冬梅，刘豪，林杰. 基于农户满意视角的精准扶贫成效评价[J]. 统计与决策，2020，36（17）：66-69.
[32] 李道和，叶丽红，陈江华. 政府行为、内外部环境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整合绩效——以江西省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2020（8）：130-142.
[33] 上官子恒，施国庆，宋亮亮，等. 基于SEM模型的工程移民社会融入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20，36（5）：87-90.
[34]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2-23.
[35] 李红莉，张俊飚，张露，等. 气候变化认知对农户适应性耕作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十县千户”的田野调查[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2）：236-248.
[36] 张绍勳. Stata在结构方程模型及其试题反应理论的应用[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7：289-293.

Study on the path of female immigrants´ social adapt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SHI Mingting[1], DANG Wei[2], ZHONG Sheng[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is one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Female immigrants are the link of maintaining family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ir good social adaptability level in the resettlement pla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ing the goal of "being stable and getting rich" in the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degree, migrant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groups will affect their own social adaptation statu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level is a relatively slow process, and not synchronous growth. Among them,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daptation level is the fastes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adaptation level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female immigrants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economic adaptation situ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situ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location. With the extension of time, the life adaptation situation will have a lag but continuous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situation of female immigrants. In addition, the neglect of unpaid care of female immigrants is also a factor restri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level. We should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ettlement policies, improve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carry out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increase support for unpaid care of female immigrants.

Keywords: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Female mi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ange

（编辑：牛晓霞）